

邓小平理论研究 (2015)

张峰◎主编



中国言实出版社

邓小平理论研究 (2015)

张 峰◎主编

 中国言实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邓小平理论研究. 2015 / 张峰主编. -- 北京 :
中国言实出版社, 2015.11

ISBN 978-7-5171-1658-5

I. ①邓… II. ①张… III. ①邓小平理论—研究
IV. ①A8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270193 号

责任编辑: 宫媛媛

美术设计: 王立霞

出版发行 中国言实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北苑路 180 号加利大厦 5 号楼 105 室

邮 编: 100101

编辑部: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甲 16 号五层

邮 编: 100037

电 话: 64924853 (总编室) 64924716 (发行部)

网 址: www.zgyscbs.cn

E-mail: zgyscbs@263.net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京华虎彩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5 年 12 月第 1 版 2015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规 格 710 毫米 × 1000 毫米 1/16 18.5 印张

字 数 300 千字

定 价 38.00 元 ISBN 978-7-5171-1658-5

CONTENTS 目 录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对邓小平理论的继承和发展	张 峰 /001
继往开来 科学发展 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新局面 姜虹 袁树平 /018	
坚持解放思想 全面深化改革	桂汉良 /024
从邓小平理论到“四个全面”战略布局	贾小明 /031
“四个全面”战略思想与 21 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新发展	王建均 /037
发挥多党合作优势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	张建明 /048
解放思想与改革开放的历史命运	路云辉 /059
论全面从严治党对邓小平从严治党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闫德民 /066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需要健康的社会法治心理	李 萍 /080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新时代条件下推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重要法宝	溥德书 /088
论习近平同志“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	吴军 祝福恩 /094
简论“四个全面”对邓小平社会科学发展观的发展	张有恒 /098
实事求是:从“南方谈话”到“四个全面”	彭冰冰 /106
“四个全面”之间的逻辑联系分析	高智生 /115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是对“三大规律”认识的新境界 赵 丰 /122

全面从严治党的理论探索 孙宝林 /128

邓小平对理想信念教育的特征分析与新形势下

 加强共产党员党性修养 韩 颖 /134

加强理想信念教育 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冯海波 /143

对“四个全面”的深入思考 刘春雷 /149

全面从严治党:对邓小平从严治党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王程程 /156

政党伦理与政党作风相关性研究 程林顺 /165

全面深化改革与完善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林少红 /173

习近平全面深化改革思想的鲜明特征 黄 刚 /182

浅论“四个全面”是在邓小平理论基础上的整合 倪立新 李淑萍 /192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和参政党作用 陆聂海 /198

“清单制度”——政府职能转变的新常态 程良波 /206

执政党要做推进协商民主发展的表率 魏晓东 /214

协商民主与乡村治理 何霜梅 /220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 刘 毅 /230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 王晓珺 /239

澄清模糊认识 坚定社会主义信念 金英君 /246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中国文化要素 张允熠 /253

河南农村金融发展现状分析及对策研究 赵 执 朱 丽 /269

民营企业扶持政策要在设计上下功夫 郭伦德 /276

以深化农村改革为动力推进现代农业大省建设 吴海峰 /284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 对邓小平理论的继承和发展

张 峰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局出发，提出并形成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布局。

2014年12月14日习近平在江苏调研时强调，要全面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主动把握和积极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协调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推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迈上新台阶。

2014年年底在全国政协新年茶话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全面贯彻落实中共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继续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突出创新驱动，强化风险防控，加强民生保障，如期完成“十二五”规划确定的各项目标任务。

2015年2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专题研讨班上发表重要讲话，明确阐述了“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他指出，这个战略布局，既有战略目标，也有战略举措，每一个“全面”都具有重大战略意义。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我们的战略目标，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是三大战略举措。要把全面依法治国放在“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中来把握，深刻认识全面依法治国同其他三个“全面”的关系，努力做到“四个全面”相辅相成、相互促

进、相得益彰。2015年2月11日,习近平总书记同党外人士共迎新春时又一次强调,要着力服务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布局。“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是从我国发展现实需要中得出来的,从人民群众的热切期待中得出来的,也是为推动解决我们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提出来的。统一战线有自己的优势,应该也完全能够为落实“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做出贡献。睿智之言、务实之策根植于人民。希望同志们深入开展专题调研,提出更多建设性、可操作的意见和建议。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是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的集中概括,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最新成果,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治国理政新思想的总称,并且有可能成为党的新的指导思想。关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理论创新成果怎样概括,经历了一个过程,先是中国梦,但只是奋斗目标的通俗表达,然后是国家治理现代化,也只是一个方面。现在看来,可能“四个全面”比较合适。因为“四个全面”战略布局集奋斗目标、发展动力、基本方略、根本保证于一体,包括了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等各个方面,并且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体布局“五位一体”相照应,深刻回答了新形势下党和国家发展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进一步升华了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规律和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的认识,内涵丰富、思想深邃、博大精深,贯穿着坚定信仰追求、历史担当意识、真挚为民情怀、务实思想作风、科学思想方法,闪耀着马克思主义真理的光辉,为我们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实现新的奋斗目标提供了科学指南和基本遵循。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虽然是最近才概括出来的,但它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是建立在党的几代中央领导集体长期的艰辛探索基础上的,特别是邓小平理论为其奠定了坚实的思想理论基础,许多重要的新观点直接来源于邓小平或受邓小平启发,背后都有邓小平的影子。可以说,“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邓小平理论的继承和发展。这里我主要依据习近平总书记在分别谈到“四个全面”时对邓小平同志著述的引用,谈谈我的理解。

这样讲有现实的针对性。最近一段时期,“左”的思潮比较严重,批判邓小平某些理论的言论不绝于耳,把改革开放以来所出现的一些问题,如贫富差距、腐败、工农群众地位下降,都归咎于邓小平的某些理论,颂扬“文

革”，甚至“四人帮”，认为资本主义在中国已经全面复辟，这是没有道理的。我们邓小平理论研究会应该对这些错误论点予以积极地回应，以正视听，坚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不动摇，巩固和发展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伟大成就。

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与邓小平的现代化思想

实现现代化是中国一百多年以来最大的梦想。新中国的成立，并没有改变我国仍然是一个贫穷落后的非现代国家的现实。共和国的缔造者们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从一开始就把实现现代化作为我们的奋斗目标，甚至在“文化大革命”那样的困难局面下，四届全国人大仍然提出在20世纪末实现工业、农业、国防、科技四个现代化。这一提法在当时曾经起到过鼓舞人心的积极作用，但实际上是难以实现的。邓小平同志很快发现过去提出在20世纪末全面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提法是“开了大口”，他主张改个口，“叫中国式的现代化，就是把标准放低一点”^①。他设想，我国在20世纪末要达到的四个现代化的最低目标，即小康水平，然后继续前进，逐步达到更高层次的现代化。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三步走”发展战略并经党的十三大正式确定下来：第一步从1981年到1990年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一番，实现温饱；第二步从1991年到20世纪末再翻一番，达到小康；第三步到21世纪中叶再翻两番，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邓小平同志制定的发展战略，既不是高不可攀的虚无的目标，也不是能轻而易举实现的目标，而是要经过几十年努力奋斗才能实现的宏伟目标。它从战略指导思想的高度解决了我们长期在经济建设中存在的急于求成的问题，是切实可行的目标，同时它又表明中国人民用一百年时间艰苦奋斗、走完发达国家几百年才走完的路程的决心，体现了中国人民的雄心壮志。

党的十六大在全国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的基础上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党的十八大根据国内外形势新变化，顺应我国经济社会新发展和广大人民群众新期待，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进行了充实和完善，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更具明确政策导向、更加针对发展难题、更好顺应人民意

^①《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94页。

愿的新要求。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贵在全面。这个全面，首先是覆盖人口的全面，就是要覆盖到全体人民，让每一个中国人都能过上充裕而又体面的日子。为此就必须走共同富裕道路，防止两极分化。共同富裕是邓小平同志设计的小康目标题中应有之义。1979年12月6日，邓小平在同日本首相大平正芳谈话时，指出：“所谓小康，从国民生产总值来说，就是年人均达到八百美元。这同你们相比还是低水平的，但对我们来说是雄心壮志。中国现在有十亿人口，到那时候十二亿人口，国民生产总值可以达到一万亿美元。如果按资本主义的分配办法，绝大多数人还摆脱不了贫穷落后状态，按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就可以使全国人民普遍过上小康生活。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坚持社会主义的道理。不坚持社会主义，中国的小康社会形成不了。”特别是1993年他在一次谈话中提出了一个“世纪之问”：“我们讲要防止两极分化，实际上两极分化自然出现——少部分人获得那么多财富，大多数人没有，这样发展下去总有一天会出问题。分配不公，会导致两极分化，到一定时候问题就会出来。这个问题要解决。过去我们讲先发展起来。现在看，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尽管邓小平同志就共同富裕问题讲过不下几十次，而关于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只讲过两三次，但令人遗憾的是，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我国形成了严重的贫富差距，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后，全国居民收入基尼系数虽然已经从2008年的0.491下降为2012年的0.474，但仍然处在高位。好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高度重视邓小平的共同富裕思想，并着手进行政策上的大调整。先是习近平同志主持起草的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必须坚持走共同富裕道路。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接着，习近平同志就任总书记时庄重承诺：“我们的人民热爱生活，期盼有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期盼着孩子们能成长得更好、工作得更好、生活得更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进一步提出，全面深化改革，“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把“促进共同富裕”作为政府的主要职责，作为改革收入分配制度的方向，并且形成了“蛋糕”不断做大的同时把“蛋

糕”分好的新思路。最近，习近平总书记多次讲，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没有农村的小康，特别是没有贫困地区的小康，就没有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提出，要更多面向特定人口、具体人口，实现精准脱贫，防止平均数掩盖大多数。这一系列的动作表明，邓小平关于走共同富裕之路实现真正小康的思想得到了继承和发展。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全面，还表现为覆盖领域的全面。邓小平同志提出的小康，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的第一步，这个现代化不仅是经济上的现代化，也是政治上的现代化、文化上的现代化。早在1979年邓小平同志就指出：“我们的国家已经进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我们要在大幅度提高社会生产力的同时，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的经济和政治制度，发展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和完备的社会主义法制。我们要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发展高尚的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①这里需要特别谈谈政治上的现代化问题。在这个问题上，邓小平同志1980年8月18日题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在2013年2月17日中央举办的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上，习近平总书记在回顾我们党探索国家治理问题历程时专门引用了邓小平这篇讲话的三段话，是有深刻寓意的。第一段话是“我们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要在经济上赶上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在政治上创造比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更高更切实的民主”。邓小平理解的现代化，至少有两个方面：一个是经济上的现代化，就是赶上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另一个是政治上的现代化，创造出社会主义的新型民主，比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更高、更切实。第二段话是“我们今天再不健全社会主义制度，人们就会说，为什么资本主义制度所能解决的一些问题，社会主义制度反而不能解决呢”。这里明确承认资本主义制度比我们的制度管用、能解决问题，体现了实事求是的态度。资本主义国家的领导人走马灯似地来回换，但万变不离其宗，谁也不能恣意妄为，干出像斯大林那样任意践踏的事情。这就是制度的力量、制度的作用。第三段话就更为重要了，“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

^①《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08页。

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

重温邓小平同志的这些话，习近平总书记认为，邓小平同志想得很深的，他考虑的不仅是要解决制约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体制机制弊端问题，而且是要解决事关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制度现代化问题。这个评价极为深刻，而且中肯。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为什么会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习近平总书记坦言，就是要落实邓小平同志 1992 年视察南方谈话提出的一个战略构想：“恐怕再有三十年的时间，我们才会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时任福州市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看到邓小平同志这段话，进行了深入思考：为什么邓小平同志要强调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什么是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为什么邓小平同志强调“再有三十年的时间”才行？我们需要的是一整套制度，是一种制度体系，而且是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体系，成熟的制度才切实管用，定型的制度才有刚性约束力。建立这样的制度体系要用相当长的时间，恐怕要由第五代中央领导集体来完成。

习近平同志对这个问题的长期思考，有了积极的成果。首先是在主持起草党的十八大报告过程中，他要求提出制度建设的目标，这就有了十八大报告“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提法。接下来在主持起草三中全会决定的过程中，习近平总书记认为邓小平同志讲的“再有三十年的时间”就是 2022 年，时间很紧了，必须把这个战略构想落实下来，提出一个总目标，并用它来统领各领域改革。相应地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到 2020 年，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上取得决定性成果，形成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过去我们讲过很多的现代化，如工业化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技现代化、国防现代化，等等，但是讲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第一次，并且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时间节点相衔接，成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题中应有之义。

二、全面深化改革与邓小平改革思想

在“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全面深化改革是发展动力。关于改革的重

要性，没有谁能比邓小平同志论述得更多、更充分。“不改革开放，只能是死路一条”，“改革开放是决定中国命运的一招”，“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不改革就没有出路”，“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这样的话在邓小平的著作中比比皆是。对于邓小平的改革思想，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是完全赞同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指出：“改革开放是党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的新的伟大革命，是当代中国最鲜明的特色，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习近平总书记也指出：“改革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生存发展之道。面向未来，要破解发展中面临的难题、化解来自各方面的风险挑战，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除了深化改革开放，别无他途。”

改革是一场新的伟大革命，不仅要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而且也要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增强活力也是改革的目的之一。活力来自哪里？首先来自于市场经济。邓小平同志率先提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主要是针对社会主义经济存在的突出问题而言的。他说：“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比较，它的优越性就在于能做到全国一盘棋，集中力量，保证重点。缺点在于市场运用得不好，经济搞得不活。”不搞市场经济，经济发展必然缺乏活力。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有一个重要的理论创新，就是明确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这个新表述是对过去“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的认识的深化和创新，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实属不易。党的十五大提出“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给市场经济配置资源的作用设置了“国家宏观调控”的前提。党的十六大、十七大、十八大分别提出“在更大程度上”、“从制度上”、“更大程度更广范围”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主要是扫清外围的工作。十八届三中全会突破核心，明确把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由“基础性”改为“决定性”。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修改，道理很简单，市场是配置资源最有效率的形式。既然叫作市场经济，就要遵循这个一般规律。作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定位，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具有“四个有利于”的重大意义：有利于在全党全社会树立关于政府和市场关系的正确观念，有利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有利于转变政府职能，有利于抑制消极腐败现象。

今天我国的改革步入攻坚期和深水区,好改的都已经改了,不好改的都留了下来,留下来的都是难啃的硬骨头。这最难啃的,恐怕就是民主问题以及相应的政治体制改革问题。在我们党的历史上,讲政治体制改革最多的也是邓小平同志。1986年9月,他指出:“我们提出改革时,就包括政治体制改革。现在经济体制改革每前进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前进,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阻碍四个现代化的实现。”这话虽然是20多年前说的,但在今天看来仍然有现实针对性。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即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实际上是一个政治体制改革的命题。因为国家治理体系是在党领导下管理国家的制度体系,也就是一整套紧密相连、相互协调的国家制度;国家治理能力则是运用国家制度管理社会各方面事务的能力。我国的国家制度主要是政治制度,由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一根本政治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等基本政治制度所构成。我们的政治制度是好的,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体制、机制、程序、规范以及具体运行存在诸多不完善的地方,还不能使政治制度的优势得到充分发挥。制度执行不严的情况也大量存在,很多制度只是摆设,还存在着视制度、规则为橡皮泥,想咋捏就咋捏的问题。制度执行力、治理能力已经成为影响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充分发挥、党和国家事业顺利发展的重要因素。因此,必须全面深化改革,特别是深化政治体制改革。

相比于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更具有复杂性,存在着一招不慎、满盘皆输的可能性。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十三大是以政治体制改革彰显其特色的。但也就是在十三大后不久,1989年我国发生了一场严重的“六·四”政治风波。这场政治风波过后,邓小平同志在同常委谈话时指出:“这次发生的事件说明,是否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是个要害。”当然,我们不能说这次事件是因为政治体制改革引起的,但至少邓小平同志此后不再谈政治体制改革,也是实情。只能说,政治体制改革要慎重,要稳妥。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上重申了邓小平同志的这段话,进一步强调,我们的改革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不断前进的改革,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

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推进改革的目的是要不断推进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赋予社会主义新的生机活力。这里面最核心的是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偏离了这一条，那就南辕北辙了。他提出了“战略定力”这一新概念。定力是稳住不动的。任尔东西南北风，我自岿然不动。面对复杂形势和各种风险考验，我们既要有冒的勇气、闯的劲头，也要始终坚持以我为主，应该改、又能够改的坚决改，不应改的坚决守住；应该改而不具备条件的创造条件，该快的一定快、不能快的则循序渐进。对看准了的改革，要下决心推进，争取早日取得成效。

我们党领导的改革历来是全面改革。问题的实质是改什么、不改什么，我们要心中有数。有些不能改的，再过多长时间也是不改，不能把这说成是不改革。我们不断推进改革，是为了推动党和人民事业更好发展，而不是为了迎合某些人的“掌声”，不能把西方的理论、观点生搬硬套在自己身上。我们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后，国内外一些敌对势力和别有用心的人接过我们的话题，认为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发展方向，应该实行西方的多党轮流执政、三权鼎立、两院制，实行“军队非党化”、“军队国家化”，等等。言下之意，国家治理现代化，就是西方化。对此，我们要有清醒的认识。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一个国家选择什么样的治理体系，是由这个国家的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决定的，是由这个国家的人民决定的。我国今天的国家治理体系，是在我国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长期发展、渐进改进、内生性演化的结果。我国国家治理体系需要改进和完善，但怎么改，怎么完善，我们要有主张，有定力。”我们治国理政的根本，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我们思想上必须十分明确，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绝不是西方化、资本主义化。

如何深化政治体制改革，重点在什么方面施力？现在看得越来越清楚，就是发展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健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十八届三中全会作出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的重大战略部署；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 65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深刻阐述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来龙去脉、科学内涵、基本特征；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加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建设；2015 年年初中共中央印发《关

于加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的意见》。这一系列的大动作表明,协商民主建设新高潮即将兴起,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新局面正在开启。《意见》开宗明义指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深化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明确表达了这个意图。

三、全面依法治国与邓小平法制思想

在“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全面依法治国是基本方略。全面依法治国的提出与邓小平法制思想有着更为紧密的联系。新中国成立之初,我们党在废除旧法统的同时,积极运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根据地法制建设的成功经验,抓紧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初步奠定了社会主义法治的基础。后来,党在指导思想上发生“左”的错误,逐渐对法制不那么重视了,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使法制遭到严重破坏,付出了沉重代价,教训十分惨痛!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邓小平同志明确提出加强法制建设。1978年12月,他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指出:“现在的问题是法律很不完备,很多法律还没有制定出来。”他要求:“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这个思想是很深刻的,实际上涉及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四个方面:立法、执法、司法、守法。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之所以把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作为主题,在一定意义上说,正是为了避免“文革”期间那种“踢开党委闹革命”以“群众专政”之名肆意践踏人权、无视法制的野蛮行为重现。

依法治国,就是法治,意味着实现国家从人治社会向法治社会的转变。也就是邓小平同志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中央工作会议上所指出的:“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建设,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对邓小平同志的这一思想,习近平总书记特别重视,他多次指出,发展人民民主必须坚持依法治国、维护宪法法律权威,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人治还是法治的问题,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史上一个没有解决得很好的问题。在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上,不少国家都没能解决好法治和人治问题。前南斯拉夫,铁托没了,那个制度和国家也就都没了。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很重要的一个原因也是没有解决好法治和人治问题。毛主席

说过，斯大林严重破坏法制，这在英国、法国、美国这些西方国家就不可能发生。我们也没能避免“文化大革命”这样的悲剧发生。法治和人治问题也是人类政治文明史上的一个基本问题，也是各国在实现现代化过程中必须面对和解决的一个重大问题。综观世界近代史，凡是顺利实现现代化的国家，没有一个不是较好解决了法治和人治问题的。相反，一些国家虽然也一度实现快速发展，但并没有顺利迈进现代化的门槛，而是陷入这样或那样的陷阱，出现经济社会发展停滞甚至倒退的局面。后一种情况很大程度与法治不彰有关。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四中全会上的讲话中总结说：“小智治事，中智治人，大智立法。治理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关键是要立规矩、讲规矩、守规矩。法律是治国理政最大最重要的规矩。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坚持依法治国，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提供根本性、全局性、长期性的制度保障。我们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坚定不移厉行法治，一个重要意图就是为子孙万代计，为长远发展谋。”

如何实现从人治向法治的转变呢？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一思想也是邓小平同志所强调的。在1980年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中，邓小平同志指出：“我们今天所反对的特权，就是政治上经济上在法律和制度之外的权利。搞特权，这是封建主义残余影响尚未肃清的表现。旧中国留给我们的，封建专制传统比较多，民主法制传统很少。解放以后，我们也没有自觉地、系统地建立保障人民民主权利的各项制度，法制很不完备，也很不受重视，特权现象有时受到限制、批评和打击，有时又重新滋长。克服特权现象，要解决思想问题，也要解决制度问题。公民在法律和制度面前人人平等，党员在党章和党纪面前人人平等。”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平等是社会主义法律的基本属性，是社会主义法治的基本要求。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必须体现在立法、执法、司法、守法各个方面。任何组织和个人都必须尊重宪法法律权威，都必须在宪法法律范围内活动，都必须依照宪法法律行使权力或权利、履行职责或义务，都不得有超越宪法法律的特权。任何人违反宪法法律都要受到追究，绝不允许任何人以任何借口任何形式以言代法、以权压法、徇私枉法。”他提出必须抓住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在2015年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班上，他又以“领导干部是全面依法治国的关键”为题进行了深入分析，指出了在法治上一些领导干部存在的五

个突出问题：第一，不屑学法，心中无法。宪法法律在他们心里成了一张废纸。第二，以言代法、以权压法。有的领导干部习惯人治、不善法治，对他人讲法治，自己搞人治，重个人权威、轻法治权威，喜欢发号施令。有的领导干部自以为是、唯我独尊，心中无党纪，眼里无国法，公然宣称“在这个地方，我就是法”。有的把“领导指示”、“长官意志”凌驾于法律之上，认为“领导的说法就是王法”。社会上流传着一个段子，叫“黑头不如红头，红头不如白头，白头不如人笔头，笔头不如口头”，讲的就是这种现象，虽然不准确，但反映了群众的一些情绪。第三，执法不严，粗暴执法。有的领导干部公然假冒法律名义侵犯公民人身权、财产权，随便抓人、把老百姓的房子拆了，还美其名曰“依法行政”。第四，干预司法，徇私枉法。有的领导干部给黑恶势力充当保护伞，官商勾结、警匪一家，个别人把干警当成家丁，让他们干谋财害命的勾当，胆大妄为，无所顾忌。有的人妄称，以法律为准绳，但绳头在我手里拽着，我松一松你就出去了，我紧一紧你就进来了。第五，利欲熏心，贪赃枉法。有的领导干部什么都敢收，多少都敢拿，胃口之大、数额之巨、时间之长、情节之恶劣，简直是明火执仗！这些问题有的是邓小平同志指出过的，有的则是新出现的，再次显示出全面依法治国必须抓住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的极端重要性。因此，习近平总书记在指出“党大还是法大”是一个伪命题的同时，又强调“对各级党政组织、各级领导干部来说，权大还是法大则是一个真命题”。他要求，领导干部要把对法治的尊崇、对法律的敬畏转化成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做到在法治之下、而不是法治之外、更不是法治之上想问题、作决策、办事情。现在，广大干部群众民主意识、法治意识、权利意识普遍增强，全社会对公平正义的渴望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强烈，如果领导干部仍然习惯于人治思维，迷恋于以权代法，那十个有十个要栽大跟头。

全面依法治国，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是个总抓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由五个方面的体系所构成，除了法律规范体系、法治实施体系、法治监督体系、法治保障体系之外，还有一个就是党内法规体系。为什么要将党内法规体系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呢？就是要实现党内法规同国家法律的衔接。宪法关于中国共产党领导地位的规定是在序言中，并没有条文化，没有形成如何实施领导的具体规定。而关于党的领导作用较